

台湾中长篇小说丛书

WANG
CHUN
FENG

钟肇政 著

望春風



2 034 9528 0

钟肇政 著

望 春 風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十月

607.143

责任编辑 周珍元

封面、插画 林发荣

台湾中篇小说丛书

望 春 风

钟肇政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四川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625印张 160千字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书号10115·612 定价 1.30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是台湾著名作家钟肇政七十年代后期的代表作之一。内容主要反映：“七七”事变后，日本唱片公司公然盗用台湾著名作曲家邓雨贤的名曲，填上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军歌、时局歌词，引起邓雨贤的愤怒抗议。日本唱片公司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企图使他就范，为日本军国主义创作宣传歌曲。邓雨贤坚决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去日本唱片公司的高薪职务，回到故乡的芎林小学任教，但仍然摆脱不了日本占领者的凌辱和迫害。在殖民统治下，怀才不遇，抑郁终生。

作者把主人公置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地台湾这一典型环境中，以民族矛盾为主线，突出地反映了一位正直、爱国的台湾艺术家与殖民当局的战争政策的尖锐冲突，表现了邓雨贤的故国之思，民族之情，乡土之恋，同胞之爱。小说还集中批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因而，这本书及其主人公受到海内外中国同胞的喜爱和赞扬。

小说以邓雨贤的音乐、教育生涯为正面，以个人感情生活为侧面，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了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有血有肉，性格复杂的音乐家形象。如小说对邓雨贤两次私情的描写，耐人寻味。他和莞妹结婚后，在他创作的高峰时期，同台北姑娘纯纯发生感情纠葛，甚至一度丢下自己的妻子，去和纯纯不正当的同居。通过妹妹和妹夫的规劝和妻子莞妹的宽容，促使雨贤认识到应该结束这“不足为法”的生活，从而实现了一家人的破镜重圆。

后来，邓雨贤回到故乡芎林小学任教，又和青年女教师纯妹相爱；偏偏另一位教师黄配又以厚礼请雨贤夫妻，充当向纯妹求婚的月老红娘；而纯妹宁可独身也不爱黄，雨贤也认为黄配不上她；妻子莞妹则想促成黄与纯妹的婚事，雨贤则在私情和理法之间，痛苦地挣扎。四人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微妙的，作者处理得很有分寸。最后，各自都作出了理智的抉择。但他们的内心世界，在作者的笔下都有细腻入微的描写，感情生活表露无遗。

序 言

我们受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委托，在领导的支持下，将陆续选编出版一套台湾中、长篇小说丛书。主要介绍台湾现、当代作家的优秀作品，以便广大读者了解“五四”运动以来，台湾的新文学创作，以及台湾同胞的生活和精神风貌。《望春风》是这套丛书中的一部，这里对本书及其作者，向广大读者作一个简略的介绍。

一

从一个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皇民化”教育的殖民地青年，到一位朴素清贫的小学教师，经过艰苦顽强的努力奋斗，战胜了重重困难，成长为台湾当代文坛的小说家。在台湾现、当代文学发展中确立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这就是本书作者钟肇政所经历过的一条文学长跑之路！

钟肇政先生，一九二五年出生于台湾桃源县龙潭乡。一九四五年三月，毕业于彰化县青年师范学校，被日本殖民当局强征为学徒兵，在服劳役修工事期间，因患疟疾，以致失聪。抗战胜利后，复员还乡，任龙潭小学教师。一九四八年，考入台湾大学中文系，就读一学期。因耳牵辍学，继续任教于龙潭小学，直到一九七八年，方从该校办理退休。其

间，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七年，曾应聘在东吴大学教授日文翻译课。一九七六年后，兼任《台湾文艺》主编、《民众日报》副刊主编等职，现为职业作家。

钟肇政少年立志，献身文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台湾作家。他自幼受的是殖民地“皇民化”的日文教育。台湾光复后，从《三字经》、《百家姓》和拼音字母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祖国文化，练习汉语写作。最初，以日文拟稿，译成汉文。其后，进而以日文思考，中文写作。最后，终于跨越了语言障碍，完全采用汉语思考和写作，实现了祖国语言的“光复”。

五十年代初期，开始中文创作，一九六一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鲁冰花》。这部长篇小说，标志着钟肇政的文学创作迈进了成熟阶段，确立了继承和发扬台湾新文学爱国进步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创作道路。此后，他以大气磅礴之势，连续发表和出版了长篇小说《浊流三部曲》、《台湾人三部曲》、《望春风》、《绿色大地》、《八角塔下》、《马黑坡风云》、《高山组曲》等近二十部，并有中、短篇小说多集，文学论著和翻译作品多部。六十年代以来，他平均每年出版编著、译作两本以上，至今总计已经发表和出版各类作品五十多部，表现了艰苦奋斗的非凡创作精神。一九七九年，曾获台湾“吴三连文艺奖”。

钟肇政是一位台湾人民的忠诚歌手，他的小说创作具有浓郁的台湾乡土色彩，深厚的中华民族感情，强烈的时代生活气息。他的作品不仅唱出了台湾苦难同胞心灵深处的呜咽，而且唱出了他们要求民族平等，祖国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理想。不仅歌颂了我国民族传统的正气和美德，

更加可贵的是歌颂了台湾人民英勇不屈的爱国反帝斗争，反映了近百年来台湾社会和时代的变迁。

台湾同胞的生活斗争，是钟肇政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他的创作题材较多来自台湾农家和中小学校生活。较早期作品的取材同他本人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他的《浊流三部曲》（包括《浊流》、《江山万里》、《流云》）三部长篇小说，先后出版于一九六二——一九六九年），描写了台湾光复前后，一位殖民地台湾青年知识分子陆志龙民族觉醒的心路历程，也就是作者亲自经历的写照。

钟肇政七十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视野更加广阔，着力于描写台湾重大历史题材和重要历史人物。他著名的大河小说《台湾人三部曲》（《沉沦》、《沧溟行》、《插天山之歌》）描绘了殖民地台湾人民半个世纪爱国抗日斗争的历史画卷，已由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里向大家介绍的《望春风》，是钟肇政继《台湾人三部曲》之后的作品，思想、艺术和语言修养又有所提高，并是他七十年代后期的重要代表作品之一。

二

《望春风》是一部描写日据台湾时期，著名作曲家邓雨贤的传记小说。

邓雨贤出生于一九〇五年，逝世于一九四四年，享年三十九岁。他虽然英年早逝，但却留下了一份富有艺术生命力的音乐遗产。远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即创作《雨夜花》、《望春风》、《月夜愁》等名曲，轰动台湾乐坛。在他创作高峰时期的三十年代，曾经谱了两百多支纯台湾风情的曲子，一扫日本流行歌曲的萎靡颓废之风。其中：《雨夜花》、《望春风》

等歌曲唱片，畅销台湾内外，盛况空前，经历了半个世纪传唱不衰，至今被公认为最能代表台胞心声的名曲。“这些歌曲，许多许多年以来，就深入每个台湾同胞的每滴血液，每个细胞之中”。“它们那令人回肠荡气，如泣如诉，却又含着一抹憧憬、一丝光明的充满台湾情调的旋律”，不仅在台湾，而且在祖国大陆，在美国、日本、西欧，远离故乡的台湾同胞，“几个人聚起来时，他们便会情不自禁地齐声唱它们，成为那些异地游子们抚慰乡愁的凭藉”。

邓雨贤是台湾桃源县龙潭乡书香世家子弟，是钟肇政的前辈小同乡。前清时代，邓雨贤的祖父一代曾出了三个秀才，其父邓旭东曾是钟肇政父亲的汉文教师。钟肇政少年时代也是邓雨贤的歌迷。由于历史渊源，钟肇政毅然担当起为邓雨贤写作传记小说的历史责任。经过同邓雨贤家属的合作，并深入采访了许多与邓雨贤有关的前辈亲友，前后花了三年以上的时问，完成了《望春风》的创作，出版于一九七七年。

《望春风》虽然是以邓雨贤为原型写成的，但作者在后记中说明，一些情节、人物有所虚构。这是一部源于生活的文学创作，成功地再现了台湾一位“人生短促，艺术无穷”的音乐家形象。作家笔下的这位历史人物的文学形象，是一位民族与乡土感情深厚，艺术宗旨健康，创作成就卓著，生活作风不无瑕疵的、有血有肉的台湾音乐家的典型。

首先，作者把主人公置身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台湾的典型环境中，鲜明强烈的时代色彩贯穿全篇，突出了民族矛盾的主线。尤其把描写的重点放在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邓雨贤的经历。集中突出了批判

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主题，历史地反映了一位正直的台湾艺术家与殖民当局战争政策的尖锐冲突，并在这一冲突中表现了邓雨贤的故国之思，民族之情，乡土之恋和同胞之爱。这是本书及其主人公受到海内外中国同胞喜爱和赞扬的思想基础。邓雨贤不是投身于台湾人民的民族、民主斗争的革命者，而是一位卓有创作才能的和平劳动者。在“七七”事变以后，台湾被迫进入“战时体制”，日本唱片公司公然盗用邓雨贤的名曲，填上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军歌、时局歌词。这种对艺术的强奸，直接违背邓雨贤一贯“忠于自己，忠于艺术，忠于同胞”的明确宗旨。邓雨贤愤怒抗议无效，因而大受刺激。其后，日本唱片公司不断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企图使他就范，为日本帝国创作宣传歌曲。邓雨贤坚决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去日本唱片公司的高薪职务。后来，他到故乡的芎林小学任教。但是，仍然摆脱不了殖民政策的迫害和日本占领者的校长、教师的凌辱。在殖民统治下，怀才不遇，抑郁终生的命运中，邓雨贤逐渐兴起了民族自觉，通过对由大陆返台乡邻刘德平的访问，认识到被日本当局宣传为战败者的祖国的雄厚力量，在他隐居芎林的后期，对祖国大陆满怀着好奇求知的热切欲望，以至于牵萦不已的心驰神往。

作者通过邓雨贤这一形象的塑造，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和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感情，处理上是得当的，恰如其分的。在邓雨贤的日人同事中，他和稻村校长及山岸老师三人关系的描写，颇为耐人寻味。稻村是一位礼贤下士的日人校长，对同事和学生不存民族歧视，对雨贤尤为尊重，为他解决生活困难，让他发挥所长，谱写乡土歌曲。山岸虽为人

师，又兼“青年团主事”，实际上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化身。他主张对学生进行野蛮的军事训练，横行霸道，大逞淫威，对青少年残酷体罚、辱骂、殴打，习以为常。邓雨贤认为，“那不仅仅是疯狂而已，那是一种民族的仇恨”。他基于对同胞的热爱，要救援被山岸罚跪的青年，“命令”他站起来回家。但雨贤一离开，那青年竟又跪了下去，因为他不敢违背山岸的“命令”，使邓雨贤深切感受到殖民地人民的悲哀。到了山岸用桌盖板毒打小学生梁照森时，邓雨贤忍无可忍，挺身而出，与山岸的矛盾冲突，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两人唇枪舌剑的一场斗争，引来稻村干涉，批评山岸“风度不太好”，要他“先向邓君道歉”。事后，雨贤承认“稻村确实是个教育家”，是一位“真正以教育者自居，懂得尊重僚属人格的校长”，他也热爱台湾乡土，“真心想埋骨斯地，为台湾的下一代教育而尽瘁”。而在这一事件之后，稻村校长却被“左迁”到规模更小的大溪郡内栅国民小学去了。取代稻村的则是另一个喜摆威严，嫉贤妒能，充满偏见的日人校长谷口，继而使雨贤陷入了新的困境。山岸、谷口与稻村同为日本人，但是他们的人品适成鲜明的对比。山岸之流使雨贤逐步认识到民族压迫的实质，更激发起对受欺凌的同胞的同情。而稻村虽然作为殖民当局派任的校长，但他不失为一位日本人民的代表，他对被压迫的台湾同胞怀有同情与尊重。邓雨贤和稻村的关系，描写得真实感人，今天仍然堪称佳话。

钟肇政虽然肯定邓雨贤是一位富于民族感情的严肃的艺术家、教育家，但却没有把他写成一位完美无缺的超人。作者以音乐和教育生涯为正面，以个人感情生活为侧面，从不

同的角度细腻地刻画了邓雨贤的精神世界，塑造了这样一位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主人公形象。邓雨贤生平中有两次婚外情结：在他艺术生涯的全盛时期，曾同台北姑娘纯纯发生感情纠葛，甚至一度丢下自己的妻子。之后，他在芎林任教期间，又和青年教师纯妹心心相印。这两次婚外情结，在艺术处理上诚然是一个难题。作者采取审慎态度，颇有分寸地解决了主人公形象塑造中的这个难题。邓雨贤的妻子莞妹是一位贤慧，坚强的女性，她并没有直接批评自己的丈夫。在雨贤和纯妹不正当的同居期间，倒是爽朗明快的妹妹莹妹同妹妹夫前往台北，规劝雨贤结束自己的荒唐生活，实现了一家人的破镜重圆。妻子的负重和宽容促使雨贤自责，认识到应该结束这一段“不足为法”的生活。因此，在第二次和纯妹的情结中，邓雨贤和纯妹都是依靠自己的理智和道德规范的约束，来加以解脱的。虽系有情人，终不及于乱。作者这样的艺术处理，既尊重了公认的道德规范，又真实刻画了主人公的人物性格。雨贤年轻时的某些生活作风上的缺陷，犹如日月之蚀的君子之过，他能够在生活的课堂上自觉地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富于理性、文明和教养的人。他和妻子莞妹终归达到了心灵上的和谐统一。

一代杰出的台湾青年作曲家邓雨贤，在日本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的前夕，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逝世。他没能看到自己的同胞庆祝抗战胜利的欢欣笑颜，没能实现前来祖国大陆施展艺术抱负的夙愿！但是，他的这一美好梦想却由八十年代的台湾青年作曲家、“龙的传人”侯德健付诸实现了。邓雨贤如果地下有知，也定当莞尔而笑的吧！

三

《望春风》的成就不仅在于塑造了一位富于民族感情的台湾艺术家的真实形象，表现了明确的主题思想和艺术观点，有助于海峡两岸同胞增进了解，沟通心灵。同时，在艺术上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钟肇政的小说创作，基本上走的是现实主义的路子，他的艺术风格是既不刻求深奥，又不流于浮浅，具有雅俗共赏的特色。

《望春风》的故事情节紧紧围绕着主人公的生平经历展开，主线突出，层次分明。作者善于把主人公的生活遭遇同殖民地的时局发展，和统治当局的战争政策密切联系起来，描绘出强烈的时代色彩。在抗日战争年代，台湾同胞蒙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压迫、政治歧视、经济榨取、文化奴役，都从主人公和相关人物的日常工作、生活中，自然而然地一一表现出来。突出了作品的认识价值和历史意义。全书二十二章，又分为五个单元，以邓雨贤的五首脍炙人口的名曲分别冠于篇首，从而贯穿主人公思想感情的发展脉络，构思上颇具深意。

《望春风》的人物描写，不论主角配角，不论中国人、日本人，都具有形象逼真的鲜明个性。作家的责任归根结底在于研究人，理解人，描写人，提高人的思想品质和人的精神境界，从而推动历史的进步。钟肇政正是这样做的。他刻画人物性格的长处是着重于内心世界的挖掘，善于写情，在平凡的日常生活琐事中，写出引人入胜的人情味来，使人物形象有血有肉，真实丰满。对邓雨贤的形象塑造，不仅深入地细致地描写了他的民族之情，而且多侧面地描写了他在哥哥

的杂货店，同工农群众、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打成一片的邻里乡亲之情。同最早的知音者“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文艺部长周添旺的友谊之情，对妻子莞妹以及家庭关系中的伦理之情，对梁照森等小同学的师生之情，尤其是对纯纯和纯妹的儿女私情，等等。例如对邓雨贤、纯妹、黄永昌、莞妹四个人物关系的感情描写：雨贤和纯妹产生了不合理的暗恋之情，莞妹虽有察觉而若无其事，黄永昌追求纯妹，一般舆论认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纯妹宁可独身而不爱黄永昌，雨贤也认为带有世俗气的黄永昌配不上天真的纯妹；偏偏黄永昌又以真诚和厚礼请求雨贤夫妇充当向纯妹求婚的月老红娘。总之，四人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微妙的。莞妹积极促成黄永昌和纯妹的婚事，雨贤则在私情与理法之间痛苦地挣扎，永昌在失恋时，表现出勇气和毅力，引起雨贤的怜悯和同情；纯妹则执着地探索着雨贤内心的奥秘。四位老师都没有逾越他们的身份、教养和尊严，他们都作出了理智的抉择。但他们内在的精神世界，在作者笔下都有着细腻入微的描写，感情生活，表露无遗，细心的读者当各有自己的体会。

自从一九七九年祖国大陆出版第一本《台湾小说选》以来，海峡两岸同胞的文学交流已经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台湾作家的许多作品已经陆续介绍到祖国大陆。但由于种种原因，介绍工作还是极为有限的，远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海峡两岸文学交流犹如祖国心海中的航船，可以把同胞的心紧密地联系起来。海峡两岸同胞都具有振兴中华的共同心愿，都盼望祖国统一，繁荣富强，民族昌盛，人民幸福的春风。我们介绍台湾文学的目的，和全国文化界的同志们一样，也是要为海峡两岸的心桥建设做点滴工作，我们愿和台

湾同胞及海内外同胞共同奋斗，为祖国的统一事业贡献一分力量，愿春风吹遍祖国大地！

武治纯

一九八四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日据时代的台湾，好比就是一块烈日炎炎，平沙浩浩，枯骨点点荒漠；或如巨石嶙峋，霜雪遍地，满目荒凉的峰顶。对一个有生之物而言，生存条件是最为苛刻的。在那里，除非是个无思无想、不感不觉的麻木者，否则，非有无止境的忍辱与坚强无比的毅力，恐怕无法生存。

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欣幸曾经出现了一位音乐巨人——你说他是绿洲里的奇葩也好，或者高山上的异花也好，不管如何，他就是在这苛刻的生存环境里绽放的一朵绚烂的花，为我们带来醉人的芳香与艳丽的色彩。然而，烈日烤炙，霜雪裂肤，毕竟不适合一棵纤细的艺术花苗的成长，他有如一颗划过天空一角，转瞬即逝的彗星——也许我们就说是天妒英才吧，那么行色匆匆地离开了他所热爱的，也热爱他的人们。

他是谁？

或许这里先提出“雨夜花”、“望春风”、“月夜愁”，这些如今已成最能代表我们台湾同胞心声的曲子吧。没有人会否认这些歌曲，许许多多年来，就渗入每个台湾同胞的每滴血液、每个细胞之中。就在这一刻，如果你扭开收音机或电视机，说不定它们那令人回肠荡气，如慕如诉，却又含着

一抹憧憬、一线光明的充满台湾情调的旋律，正在播放之中。

敬爱的读者们，如果你是中年以上的人，让我提提“月夜的鼓浪屿”（“月のコロソス”）吧。或者“军夫の妻”，“誉水の军夫”吧。也许可以引起你一段遥远遥远的记忆——时当“支那事变”、“大东亚战争”的时期。或许那时你还是个孩童、青年，想来这些歌曲你一定也唱过，至少也听得很熟很熟的。是不是？

当时，日阀当局为了“遂行圣战”、“膺惩暴支”，从我们台湾强迫征召了几十万青年，称之为“军夫”，送到前线去充当炮灰。日阀为了宣传做一名军夫，为皇军服务，为大日本帝国出力，为天皇陛下而战死，是台湾人最大的名誉。所以，让每一个台湾人唱这些歌。在小学里，它们成为必教必唱的教材。于是，每个孩童，在台湾的每一条街头巷口，在每一处穷乡僻壤，都高声朗唱。

这里容我赶快声明，这些歌曲，当然不是为这一类歌词而谱的，它们原本就有，亦即“雨夜花”、“月夜愁”、“望春风”等等。只不过是日阀给这些早已脍炙台湾民间的曲子，配上那种宣传歌词而已。作曲者当然未同意，但是，不表同意又如何呢？只因这些曲调实在是纯粹的“台湾的”，是与当时的台湾人的血液之流同其节拍、同其旋律的。因而，配上了那些日语歌词之后，仍能大为风行。

日阀看准的也正是这一点，这大约也可以说是他们的聪明处、毒辣处。然而，这是对一个艺术作品的强奸。以一个艺术家而言，情又何以堪呢？

我们这位艺术家也就是为了这情形，不得不逃避现实，躲到一个遥远偏僻的乡村。可是，他逃得了吗？炎炎烈日，

冽冽霜雪，在当时的台湾是无所不在的。说他不能无止无境地忍辱，缺乏坚强无比的毅力，这恐怕不是十分公平的。总之，他落落寡欢、郁郁无心，不久之后，就这样赍志以殁！

尽管如此，台湾光复之后，那几首歌终于又恢复了本来面目。许许多多年来，它们搭乘着无形的电波，越过有形的广大空间，在每个家庭，每个街头巷尾，每个穷乡僻壤，给人们带来温暖的感爱。甚至远适异乡的人们，好比在美国、在日本，甚至在欧洲，几个人聚起来时，他们便会情不自禁地齐声唱它们。它们成为那些异地游子们获得抚慰乡愁的凭藉。

但是，如今还有谁认识这位天才音乐家呢？他的大名早已埋没草莱——或许有人要说，我们只是喜欢那些歌，能靠它们得到温暖，得到慰藉便够了，谁作的曲子，岂不是无关宏旨吗？

这正应了西谚：“人生短促、艺术无穷”。不错，谁作的曲子，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令无人认识他，我们的音乐家无疑也会含笑九泉的。不过，如果你想知道他是谁，容笔者在这里告诉你：他就是桃园县龙潭人——邓雨贤！